

【書評】

橫看成嶺側成峰：評介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

鍾逸明**

《洪憲帝制外交》(以下簡稱《洪》)是臺灣東海大學唐啟華教授新近寫成的一部力作，重點探討 1915 年 6 月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結束，到 1916 年 6 月袁世凱去世，約一年間圍繞帝制問題的中國外交。

《洪》第一章先透過「英國購買中國軍火交涉」，介紹袁世凱稱帝前夕的國際局勢。由於歐戰演變成為壕溝戰、持久戰，再加上英軍在加里波利戰事失利，因此英國非常希望在中國購買槍械，也希望中國參戰。如作者所言，圍繞購買中國軍火的交涉「在英國內閣中形成一個特殊語境，讓倫敦對中國軍火及兵工廠懷有濃厚興趣，使得英國政府高層在歐戰局勢不佳之際，大力支持中國參戰。」¹這恰恰與當時日本對華政策針鋒相對，為英

*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370。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¹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32。

日圍繞袁世凱稱帝與中國參戰發生的矛盾埋下了伏筆。

第二章〈帝制推動時期的外交〉敘述了袁世凱為稱帝進行的一系列工作及其成效。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否認自己先後出使墨西哥和美國和帝制有關，而唐啟華教授表明，顧氏的說法並不足信。實際上，他「一方面聯美制日，一方面收集歐美輿論對帝制的看法，並在歐美製造輿論。」²1915年8-10月，帝制運動在國內外皆順利推動。

第三章「列強第一次勸告」提到10月上中旬，日本內閣和軍方在圍繞對華政策的辯論中壓倒以山縣有朋為首的元老派，占據上風。日本內閣和軍方隨即於10月28日主導提出第一次勸告，協約列強不得不追隨。面對局勢的突變，袁世凱稍作妥協，暗示本年內不改制。不過日本內閣和軍方對袁世凱的答復不能滿意，準備聯合列強再提出第二次勸告。

第四章「1915年11月中國參戰交涉」提到袁世凱與帝制派於11月初提出中國參戰建議，企圖「聯英制日」，但是由於沒有看清全球大局，弄巧成拙。袁世凱不但沒能實現參戰的目標，還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惡感。

第五章談到列強第二次勸告到護國軍在雲南起事。12月15日下午，駐北京日、英、俄、法、義五國公使同至外交部進行第二次勸告。對於此次勸告，無論是中國輿論，還是北京外交部，以及袁世凱本人，都認為並不嚴重。唐啟華教授對袁世凱的一紙手片進行解讀，深刻地揭示了袁氏當時之判斷與謀略。手片寫到：「西引入戰團東不允。東勸緩西不助。聯恐德先承認其所望，不敢遲認。西先認東自不能獨異。」唐教授認為這段文字意指：英、俄、法欲將中國引入協約國參戰，日本不允許。日本勸告中國延緩帝制，英、俄、法不幫助。協約國害怕德國先承認中國帝制，不敢晚於德國承認。英、俄、法先承認，日本不能獨自不承認。³可見此時袁世凱很有信心，認為日本遲早要跟隨列強承認帝制，但卻失算了。

早在列強第二次勸告的隔天，即12月16日，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與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會晤，石井提出日本政府可與各國協商承認中國改制日期。陸宗輿錯聽為石井與首相大隈重信商議此事。因此，北京外交部自

²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45。

³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229。

行與各國商議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導致中日外交決裂。與此同時，雲南護國軍起事，但尚未形成強有力的反袁勢力。

第六章〈護國軍起事到延緩登基〉寫到農商總長周自齊作為特使赴日交涉，推翻學界關於「周自齊赴日，係商議日本承認之條件」的成說。⁴

1916年1月12日發生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遇刺事件，進一步促使日本對華態度轉趨強硬，日方遂拒絕中國特使，以窘辱北京政府。1月21日，北京以內外不利，決定延緩登基。如唐教授所言，「袁世凱帝制功虧一簣，自此帝制派人心潰散，反袁勢力聲勢高漲。」⁵

第七章〈暫緩登基到袁世凱去世〉著重敘述1916年1月下旬以後「協約列強在華越發追隨日本」，「日本浪人及軍方大力支持反袁勢力，局勢發展對袁氏愈趨不利」的過程。期間雖有「中日親善的試探」，但「效果很有限」。3月7日日本內閣在陸軍建議下制定〈對於中國目下時局日本所執政策〉，制定了全力倒袁的方針，使「瀕臨崩潰邊緣」的護國軍得以東山再起。⁶

事已至此，「袁世凱命令取消帝制，對內停戰媾和，希望能維持總統權位；並以日本乘中國內亂謀取漁利，號召國人合力禦外」，而事實上英美也支持袁世凱繼續當總統。然而當時日本已在東亞占據主導地位，而「日本大力支持反袁勢力，務必要讓袁氏完全退出政壇」。⁷最後導致袁世凱身敗名裂，隨即病死。

2010年，唐教授的《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出版，書中對袁世凱對日外交評價很高：「(二十一條)交涉期間，袁世凱全力周旋，迫使日本以最後通牒威脅，並主動撤去危害最大的第五號，其餘各條也做了許多修改。」⁸袁世凱稱帝，不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還對中國外交造成了巨大影響；因此，繼研究「二十一條」交涉之後，研究洪憲帝制外交，可謂順理成章。同時，唐教授寫作《洪》的時間，大概落在

⁴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257。

⁵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288。

⁶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299-300、305。

⁷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305。

⁸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172。

洪憲帝制百年。多名學者都不約而同關注帝制與袁世凱，絕非偶然。岡本隆司在 2015 年寫作出版《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中譯本出版於 2016 年)、馬平安在 2016 年寫作出版《大抉擇：大變局中的袁世凱》，以及唐教授的《洪》，反映了學術界在重要時間點對袁世凱及洪憲帝制的普遍關注。⁹

和他以往的研究一樣，唐教授採取「多國檔案對照法」的一貫做法，恪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在耙疏大量中、日、英、美檔案的基礎上，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相，從而在該領域研究實現了極大的突破。實際上，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徐中約(Immanuel C. Y. Hsu, 1923-2005)在他的“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一文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國外交史研究必須是跨檔案、跨語言、跨學科、跨文化和跨意識形態的。」¹⁰近年來，華南師範大學左雙文教授在提出他對拓展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看法時也指出，研究者應該「重視開展中國與多國、與若干個國家關係的綜合研究，研究中國與某一國的關係時，注意並熟悉中國與另一個或幾個相關大國的關係」，因為「實際上並沒有單一的、純粹的中國與某一國的關係史，而必然是綜合的、中華民國與多個國家的外交史」。這就意味著，研究者也必須注重「對不同來源的、多方面的史料的綜合利用、研究，相互參證」，因為惟有如此，才能「擴大自己的視野」，「得到對歷史更為豐富、更具有複雜性的認識。」¹¹由此可見，目前學術界已經就「多國檔案對照法」的必要性達成共識；近年來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世界範圍內，圍繞中國的國際政治史、外交史研究正方興未艾，採取這種宏觀視野進行研究，實在是挖掘歷史豐

⁹ 岡本隆司 著，李雨青 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6)；馬平安，《大抉擇：大變局中的袁世凱》(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這兩部著作都著重探討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凱，只用了一個章節的篇幅討論洪憲帝制。而且岡本隆司的《袁世凱》似乎低估了日本政府反對帝制的程度(認為日本政府對袁世凱稱帝僅僅是「冷眼旁觀」，在護國軍起事後，不過「表明了反對救援的態度」)並誇大了護國軍的作用(「對袁世凱造成決定性影響的，還是軍事情勢」、「他急忙組織起來的鎮壓軍卻在首戰一敗塗地」)。參見該書頁 228。

¹⁰ Immanuel C.Y. Hsu,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A Guide to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1 (Jan. 1979): 102.

¹¹ 左雙文、王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史學月刊》2010年第 1 期 (2010.01): 55。

富性、複雜性的不二法門。¹²

唐教授熟諳多國語文，並且多年從事北洋外交史研究，因此寫成《洪》，可謂駕輕就熟。同時，從事學術研究還經常意味著補充、加深、修正，甚至推翻前人研究。因此，惟有將《洪》與此前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比較，才能比較客觀公允地評價其價值。其實，《洪》出版之後不久，騰訊網編楊津濤就發表了一篇介紹性的文章，概括了《洪》的內容。不過，該文以介紹為主，幾乎沒有進行評論。筆者不揣淺陋，寫就本文，旨在探討《洪》的主要特點，通過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的比較，討論其研究品質和學術貢獻，兼及其在研究視角、方法和觀點各方面對筆者的啟發。

一、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實現研究的細化

《洪》提到北洋政府同時被國共兩黨視為革命對象，因此，以往海峽兩岸的北洋外交史研究大多囿於意識形態，對洪憲帝制極盡口誅筆伐之能事，無法進行冷靜客觀的評價。¹³同書還列舉出以往許多的研究成果(當然，其中不乏政治宣傳品，如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進行說明，在此不擬復述。

值得一提的是，遲至世紀九十年代，時任中國海專講師的臺灣學者黃德福在其《袁世凱政權與英國》仍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儘管他廣泛地掌握各方檔案材料(和唐教授基本一樣，利用了中研院近史所檔案、日本外交文書以及英美外交檔案)，對史料的解讀分析卻難免有失偏頗。舉例來說，黃德福認為，「袁世凱欲帝制自為，喪失民心，直接與民為敵，卻給予日本暗中動手倒袁的良好機會，這是袁世凱難逃敗亡的主因。」¹⁴應該說，在掌握史料的基礎上承認日本倒袁，不再一味地指責袁氏「竊國」、「賣國」，這

¹² 川島真教授指出，儘管外交史研究在20世紀上半期一度受到國際關係學與國際政治學的大力批判，但以中國為對象的外交史研究具有「後發型」的性質，到21世紀更呈現了新的發展。可見川島真對該領域未來發展的樂觀。參見川島真，〈20世紀以來中國外交史研究：以日本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01): 134，注2。

¹³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2。

¹⁴ 黃德福，《袁世凱政權與英國：從辛亥革命到洪憲帝制》(臺北：元氣齋出版社，1994)，345。

已經代表了某種突破。然而，囿於意識形態，黃德福卻又不能不「自圓其說」，低估日本倒袁的作用，把袁世凱「直接與民為敵」作為帝制失敗的主因。

當他嘗試對洪憲帝制失敗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時，這一點就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來了。他聲稱：「(梁啟超、蔡鍔)最後的勝利並非因為他們有過於袁氏的實力，而是他們恃著維護共和的正義精神，得到全國人的感佩與支持，使袁氏在心理上難以抗爭。」¹⁵他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卻是梁啟超本人所寫〈護國之役回顧談〉的一句話：「護國成功，原來是全國民心理所造成，並不是靠一部分幾個人之力。」今天來看，由此推導出來的結論相當牽強，至少是有失嚴謹的。同時，這何嘗不是對歷史研究者的一種提示：大多數學者注重挖掘新史料，卻不自覺地受到意識形態束縛，以致掌握基本相同史料的兩名學者，得出的結論相去甚遠。換句話說，對史料的解讀和利用，很多時候反而比掌握史料本身更加重要。唐教授得益於早年在英國留學，師從 Ian Nish 教授的經歷，奠定了從事實證研究的扎實基礎，在同輩學者當中，實屬難能可貴。

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研究的細化。近年來，有大陸學者指出：「對於日本對袁世凱帝制的政策，國內的研究有單一化傾向。首先，對日本態度的變化止於定性判斷而缺乏對其過程及變化原因的分析……。其次，對日本內部各政治勢力沒有進行區分，對其政策主張的異同點及其出發點研究不夠充分。」¹⁶其實，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綜觀早期學者的研究，大多粗枝大葉，在具體問題上則模棱兩可。例如林明德寫到「洪憲帝制的破產，日本的關係最深」、「日本的事前慾惠引誘與事後的干涉，十足顯示日本擅於翻雲覆雨的作風及其對華外交之酷辣」，將「日本」視為鐵板一塊，籠統地稱「日本」，而沒有提及任何具體人物或梳理整個決策過程。¹⁷又如黃德福寫到：「但中國熱衷於帝制運動者，不查日本態度已轉趨

¹⁵ 黃德福，《袁世凱政權與英國》，365。

¹⁶ 趙敏，〈袁世凱帝制與日本之應對〉(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14)，4。

¹⁷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127。

積極，對日、英關係與當時之國際情勢，亦不能正確把握。」¹⁸黃氏的見解固然十分精闢，然而，針對「當時之國際情勢」究竟如何的關鍵問題，卻又沒有進行詳細闡述。又如大陸學者俞辛焞寫到：「在中國西南各省反帝制、反袁運動此起彼伏的情況下，日本的對帝制政策與歐美列強相異，由決定承認帝制轉為阻止帝制」，完全將日本對華政策的改弦易轍歸因於護國軍起事，顯得比較牽強。¹⁹唐教授在寫《洪》的時候，在利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關注大至歐戰戰局的全球局勢，小至軍火案、陸宗輿聽錯石井所言的事例，詳細地釐清了此前學界有意無意模糊化的一些問題，這本身就代表了某種突破。

二、採取全球觀察的視角

《洪》和此前研究的不同之處還在於該書所採取的全球觀察的視角。雖然其他學者早就注意到英國由於歐洲戰局不利，無法大力支持袁世凱稱帝，但是大多只是泛泛而談，並未詳細說明。²⁰與此不同的是，唐教授充分地重視了歐洲戰局失利的影響，不僅提到英法及澳紐聯軍在加里波利(Battle of Gallipoli)鎩羽而歸，還專辟一章討論由歐洲戰事吃緊間接導致的軍火案。總而言之，研究洪憲帝制外交，不能不注意到歐戰爆發導致英國在遠東勢力式微、不得不遷就日本的大背景。

筆者由此聯想到 1915 年 2 月駐新加坡的印度士兵(第五步兵團)發動起義。當時，英國當局可調動的兵力不足六百人，根本無力鎮壓起義，只好向附近的日、法、俄等國部隊求援。實際上，參與鎮壓行動的主力由日本人組成。除了日本軍方派遣的海軍陸戰隊外，日本駐新加坡公使館也動員了特別員警協助鎮壓起義。²¹一方面，日本國內「主要在英日關係惡化的大背景

¹⁸ 黃德福，《袁世凱政權與英國》，368。

¹⁹ 俞辛焞，《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563。

²⁰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3.4 (Dec. 1970): 706.

²¹ Ooi Keat Gin, "Between Homeland and 'Ummah': Re-visiting the 1915 Singapore Mutiny of the 5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of the Indian Army," *Social Scientist* 42. 7/8 (July-Aug 2014): 87. 當時的日本報《南洋新聞》記者塚田(M. Tsukada)就不無得意地寫到日軍

下討論這場鎮壓行動，尤其是兩國圍繞在華殖民利益衝突日漸滋長的惡感。……日本輿論界的部分重要人物直言不諱地提出，日本參與鎮壓印度兵起義，完全是為了展示自身實力」。²²另一方面，日本軍方的積極行動，甚至引起了國內部分媒體的不滿，指責軍方越俎代庖：「我們當然要成為遠東的衛士，不過日本必須為本國利益，而非英國利益成為遠東的衛士。」²³

在鎮壓行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雖然難免帶有渲染誇張的成分，但是英國海軍部要求將塚田的記載翻譯成英文，足見它所引起的重視。新加坡軍事史著作*Between Two Oceans*也引用了塚田的大段記載。參見Malcolm H. Murfett, John N. Miksic et al.,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6-168, 171. 該書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這次起義，挖掘了不少史料，也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包括R.W. E. Harper and Harry Miller, *Singapore Muti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o Kuwajima, *Indian Mutiny in Singapore* (Calcutta: Ratna Prakashan, 1991); T.R. Sareen, *Secret Documents on Singapore Mutiny, 1915* (New Delhi: Mounto Publishing House, 1995); Edwin A. Brown and Mary Brown, *Singapore Mutiny: a Colonial Couple's Stirring Account of Combat and Survival in the 1915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2015); N. Nedumaran, *The Forgotten Sentinels: The Sepoys of Malaya, Singapore & South-East Asia (the Founding Years: 18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 np, 2017). 此外，英國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分別藏有關於1915年印度兵起義的檔案檔和口述史材料。遺憾的是，據筆者所知，此前研究多從英國軍事史或印度民族主義入手，沒有從整個遠東局勢的大背景進行分析。近年來美國學者Heather Streets-Salter的研究突破前人窠臼，在這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值得一提的是，她指出起義被鎮壓後，英國當局對進出新加坡的報刊和書信進行審查，儘量低調處理後續工作，避免事件擴大化。比如英國當局輕描淡寫地將起義定性為「嚴重騷亂」(serious riot)，遮蔽了這起事件複雜的國際背景。參見Heather Streets-Salter, *World War One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in an Era of Glob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2. 就目前的材料來看，這次起義也沒有在當時的中國或北洋政府引起太大關注。北京外交部僅僅電飭駐新加坡領事呼籲當地華僑奉公守法，避免惹事。Heather Streets-Salter認為，當時袁世凱早已下定決心加入協約國陣營；為了避免得罪英國，才採取這一政策。參見Heather Streets-Salter, *World War One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in an Era of Global Conflict*, 79.

²² Sho Kuwajima, *Mutiny in Singapore: War, Anti-War and the War for India's Independence* (New Delhi: Rainbow Publishers, 2006), 169-170. 印度殖民政府對日本勢力的擴張就懷有戒心，在鎮壓行動結束後不久，就建議倫敦外交部終止英日同盟，因為該同盟「有損英國在亞洲的聲譽，並沒有多少用處(the alliance had been injurious to the British reputation in Asia and served no useful purpose)。」T.R. Sareen, *Japa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Delhi: Agam Prakashan, 1986), 3.

²³ T.R. Sareen, *Secret documents on Singapore Mutiny, 1915*, 19. Sareen並未說明所謂「日本媒體」(Japanese press)指的是哪些報刊。

如桑島昭所指出的，事後無論是駐新加坡英軍司令部，還是馬來亞柔佛州政府參政司給倫敦的報告，都有粉飾太平之嫌。前者聲稱：「事實上，日本人(在鎮壓起義方面)做得並不多」，後者更是認為新加坡當地居民依然「絕對依賴英國統治的智慧和力量(the absolute reliance on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British rule)」，真實情況卻恰恰相反。²⁴不久後，印度兵起義獲得成功的謠言更傳到了馬來亞吉蘭丹州，使當地人民認為英國在遠東防務空虛，在四、五月間引起了另一場起義。²⁵除了這兩場起義，日本在歐戰中更廣為人知的軍事行動——擔任進攻青島的主力、占領德屬太平洋群島、追擊德國軍艦埃姆登號(Emden)等，都揭示出歐戰期間英國在東亞勢力的衰微。²⁶確切地說，發生於袁世凱稱帝之前的這些事件，已經揭示了英日兩國在遠東勢力此消彼長的態勢。當然，筆者進行這段討論，實在無意於批評《洪》的疏漏(這些事件本來就偏離了「洪憲帝制外交」的主題)，只不過希望拋磚引玉，藉此開拓新的研究思路。

關於袁世凱於清末在朝鮮問題上與日本打交道的經歷，《洪》只是蜻蜓點水地提到這段經歷「讓他對日本抱很深的戒心和反感，同時他也成為日本大陸浪人在辛亥革命後主要防備與攻擊的對象」。²⁷其實，考慮到這段經歷對於日後中日關係史走向影響之大，或許值得進一步研究和闡述。

這個問題引起了筆者的好奇。筆者發現，發現甲午戰爭爆發前十年，袁世凱一直致力於加強清廷對朝鮮的控制。當時許多日本政界人士，包括輿論界，就已經對袁世凱刮目相看，也可以說是既欣賞又痛恨。他們的這種看法，基本上一直延續到洪憲帝制時期。舉例來說，一名普通的日本記者

²⁴ Sho Kuwajima, “Indian Mutiny in Singapore, 1915: People Who Observed the Scene and People Who Heard the New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1 (June 2009): 383.

²⁵ Ban Kah Choon, *Absent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pecial Branch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15-1942* (Singapore: SNP Media Asia, 2001), 48-49. 此外，據英國駐馬來亞吉打州參政司所言，日本海軍軍官曾嘗試慫恿當地馬來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參見Commander-in-Chief’s Office, China Station to Admiralty, 14 December 1916, ADM 125/64/261. 可見英日同盟的表象之下，兩國之間互相猜忌之嚴重。

²⁶ 參見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3.

²⁷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83。

佐藤鐵治郎就指出：「袁世凱見我兵勢洶洶，勢難了結，而華兵又不來援，遂藉病請假，乞李鴻章准其離韓。……自此以後，清韓之關係遂絕。而袁世凱十餘年之權謀，盡隨太平洋之潮流而東逝矣」。²⁸顯而易見，佐藤鐵治郎將袁世凱視為維持並加強清帝國對藩屬國朝鮮控制的關鍵人物。今天讀來，他的另一段評價更讓人吃驚：「就其思想與魄力言之，袁尚在曾、李之上。……使袁所行之政策，皆能達其目的，則支那雄長東方，為地球強國，袁之功業，又非曾、李所能望其肩背也」，對袁世凱可謂推崇備至。²⁹

上世紀六十年代，加拿大學者陳志讓的《袁世凱傳》(*Yuan Shih-k'ai*)提到：「除了執行中國的政治策略以外，袁世凱還為中國擴大在朝鮮的經濟影響發揮了作用。在這方面，他通過三個創新，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首先，他引進了一項電報服務，與釜山和長崎之前的海底電纜競爭，……第二，袁世凱致力於擴展中朝貿易，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第三，袁世凱通過漢城的廣東商行同順泰，為朝鮮政府安排了兩筆借款。」同時，他引用了仁川、元山與釜山進口的中國與日本商品比例的數據，反映出 1885-1892 年期間，中日在朝鮮經濟影響力此消彼長的情況，並將之歸功於袁世凱。³⁰

或許，正是由於袁世凱早年在朝鮮成功地遏制了日本，塑造了他的「日本觀」，認為日本不足為懼，也使他在參戰和稱帝的問題上發生誤判。事實證明，這兩方面的誤判，導致袁氏政權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撐，弄巧成拙，堅定了日本內閣和軍方反袁的決心，最終成了袁世凱的致命傷。

最後，考慮到洪憲帝制與參戰問題密不可分(實際上《洪》的其中一個章節也專門討論了 1915 年中國參戰的努力)，可以考慮進一步凸顯這種關係，甚至將《洪》與《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合為一本書，或許可以讓讀者更加瞭解其中的因果關係和來龍去脈。

²⁸ 佐藤鐵治郎 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整理，《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0。

²⁹ 佐藤鐵治郎，《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207。

³⁰ 陳志讓 著，王紀卿 譯，《袁世凱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2-33。

三、見證扎實的史學研究

書中數處在提到多國之間交涉的時候，都會注明有關各方的記載出處。如 1915 年 10 月 21 日，朱爾典與小幡西吉就聯合勸告袁世凱暫緩帝制；1915 年 11 月 20 日，白廳約見井上大使商討中國參戰問題，都參考了英日兩國檔案的相關記載。³¹另外，在參考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時候，注意對照 1933 年與 1982 年版本之異同。在一本書有多個版本的情況下，一般引用原始版本。凡此種種，足見唐教授治學之嚴謹。

儘管唐教授的研究重心始終放在中日交涉，但是他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的作用。例如，「主張對袁世凱提攜的必要，強烈排斥干涉中國內政」的元老派代表人物山縣有朋於 1916 年 2 月初到 5 月中旬重病臥床，無力反對內閣和參謀本部制訂的倒袁政策。又如陸宗輿聽錯石井所言，釀成誤會等。這些偶然事件看起來或許是小事，卻造成了重大影響，唐教授皆給予了充分重視。

四、外交史與軍事史、國內因素與外國因素之間的關係

如前文所述，許多學者在探討洪憲帝制失敗的原因時，往往無法回避國內反袁勢力與日本之間的關係。Ernest P. Young 就認為，「日本政府並沒有培養出反袁勢力；相反地，它利用了中國國內反袁情緒日漸高漲所提供的機會」。³²有鑑於此，如果希望深化現有研究聚焦於護國戰爭，探討護國軍戰略、物資、槍械、彈藥等問題似乎大有可為。事實上，確實有學者對護國戰爭中四川民眾進行考察，認為護國軍的勝利，應該主要歸因於當地民眾的大力支持。³³即便如此，該領域肯定還存在進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間。軍

³¹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91、157。

³² 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239.

³³ 朱華、范鵬鵬，〈護國戰爭中四川民眾的歷史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64(2017.03): 119-128。

事史與外交史是否存在互補關係，是否可以被視為「姐妹學科」？這實際上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國內因素與外國因素對於反袁、反帝制的力量對比與交互作用的影響。此書作為外交史著作，強調國際背景、外國和外交因素自屬理所當然。但袁世凱的帝制問題畢竟是中國國內事務。

太平天國之亂後，中國內部存在各種勢力與組織，各種複雜的交錯作用均能撼動中央。中國是大國，其內部因素的總和作用往往大於外部因素的影響，袁世凱主政的時代中國並不似後來的軍閥主政時代那般衰弱，因此也不容忽視內部因素的作用。

綜觀海峽兩岸對民初政治外交的研究，探討 1910 年代末和 1920 年年代初內外因素互動的成果不算少。³⁴如果學界能夠給予軍事與內政問題更多關注，相信能進一步豐富目前對洪憲帝制的瞭解。

五、《洪》的一些「盲點」

唐教授十分謙虛，在《洪》結論部分坦率地指出一些不足之處或者一些「盲點」：「本書最大缺失應在沒有參考同盟國方面，尤其是德國的視角」；「本書以袁世凱及帝制派為中心探討帝制外交，對於帝制運動的內政因素與成敗之關係基本沒有涉及」。³⁵

另外，日本在歐戰中的地位十分特殊。日本執行投機主義的外交方針，在兩大陣營之間左右逢源。占領青島之後，儘管日本原則上與德國處於交戰狀態，但是占領軍卻對德國平民異乎尋常地友善。³⁶英國國防部在一份秘密備忘錄裏指出，「在 1915 年，日本非常擔心『站錯隊』，因此，日本反對協約國迫使她採取任何可能冒犯德國的行動」。1915 年 1 月，德國委派保

³⁴ 例如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³⁵ 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354。

³⁶ 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32.

羅·馮·辛慈(Paul von Hintze)作為新任駐華公使。辛慈告訴日本駐華公使，德國不僅讓日本占據青島以及太平洋諸島嶼，而且將比協約國更加願意讓日本在中國自由行動。³⁷確實，如果把德國企圖拉攏日本的努力加進去，或許更夠更好地解釋英國在1915年的處境：同情袁世凱，希望中國參戰，但更不願意看到日本退出協約國陣營，甚至與德國結盟。

筆者瀏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檔案，發現德國非常積極地開展對華外交、進行秘密活動——除了企圖制止華工赴歐，還派遣武官前往內蒙。³⁸當然，如果希望進一步瞭解其中內幕，還需查閱德日兩國相關檔案。另外，美國學者Heather Streets-Salter注意到德國長期與流亡中國的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支那)反對英法殖民統治的革命者保持密切聯繫並給他們提供幫助。她還提到，就在1915年11月中國政府進行參戰交涉前不久，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和朱爾典曾請求中國外交部取締中國境內反殖民統治的活動。³⁹不僅如此，近年來大陸學者同樣在掌握各方史料的基礎上對洪憲帝制外交作出了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這也是《洪》所忽略的。⁴⁰最後，筆者發現美國學者Ernest P. Young在*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一書中利用了袁世凱兩位西洋顧問的文稿以及英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朱爾典文稿(FO 350)，而《洪》似乎並未引用這些史料；如果予以充分重視，或許可以彌補該書的某些不足。⁴¹

³⁷ 徐國琦著，馬建標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111-112。

³⁸ 例如「請電飭禁止在上海招工赴法國」，03-31-001-02-015，1916年10月；「德武員往內蒙事」，03-36-040-01-035，1915年3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相關檔案數量相當大，在此無法一一列舉。

³⁹ Heather Streets-Salter, *World War One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in an Era of Global Conflict*, 202.

⁴⁰ 這些成果包括：周彥，〈日本與洪憲帝制〉，《求是學刊》1994年第2期(1994.03): 113-118；劉娟，〈洪憲帝制時期的中日外交〉(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1)；王愛雲，〈洪憲帝制運作及敗亡新探〉，《蘭臺世界》2012年第24期(2012.08): 76-77；張萬舉，〈芻議日本對袁世凱帝制運動之影響〉(杭州：浙江工商大學碩士論文，2015)。

⁴¹ Ernest P. Young,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323.

六、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洪》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探討 1915-1916 年洪憲帝制外交的著作。儘管存在著一些所謂的「盲點」，但是瑕不掩瑜，該書依然達到了洪憲帝制外交研究一個新的高度，甚至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寫成《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書，⁴²呼籲學術同行採用中國視角研究中國歷史，隨即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熱烈討論；隨著《洪》的出版(以及將來英譯本的面世)，相信該書作者長期以來「從北洋的視角來考察近代史」、「提供更合乎中國國情的歷史詮釋角度」的呼籲也會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和討論。⁴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提示我們，儘管「檔案研究與文化史研究可相輔相成」，但是「近年來學界受限於檔案史料及政治環境，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之實證研究成果減少，文化史研究大幅度成長」，糾正學術研究上的這種失衡，實在是「今日近代史學界的當務之急」。⁴⁴在中國對日關係史方面，該書同樣代表了作者「與國家史脫鉤，超越民族與國家觀念上的束縛」的嘗試，並且提示兩岸(尤其是大陸學者)，對於長期主導外交史研究的「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以受害者的悲情立場，譴責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的視角實有反思之必要。⁴⁵該書對中國與一戰研究的貢獻同樣不容忽視。如前所述，雖然徐國琦注意到袁世凱及其領導下的北洋政府對一戰爆發的積極反應超出了學界此前的認識，但是徐氏主要關注華工問題，對 1915 年底中國參戰嘗試的考察，還是稍嫌不足，而《洪》很好地填補了這一空白，通過敘述英日兩國在華的矛盾與妥協，突顯了一戰作為「世界大戰」的歷史面貌。同時，中日外交和許多其他問題息息相關，研究範圍似乎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⁴² 柯文 著，林同奇 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

⁴³ 唐啟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51.3 (2014.05): 68。

⁴⁴ 唐啟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69。

⁴⁵ 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興大歷史學報》15 (2004.10): 215；唐啟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68。

任何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們自然不宜提出過於苛刻的要求。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採用革命史的視角看洪憲帝制外交，它呈現出某種表象；然而，在廣泛掌握和解讀史料之後，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則又呈現出另一種面貌，這大概就是研究北洋外交史的魅力和吸引力所在。

徵引[書目]

(一)檔案

1. Commander-in-Chief's Office, China Station to Admiralty, The UK National Archives, ADM 125/64/261.

(二)專書

1. Ban, Kah Choon. *Absent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pecial Branch Operations in Singapore 1915-1942*. Singapore: SNP Media Asia, 2001.
2. Brown, Edwin A., Brown, Mary. *Singapore Mutiny: a Colonial Couple's Stirring Account of Combat and Survival in the 1915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Monsoon Books, 2015.
3. Harper, R.W. E., Miller, Harry. *Singapore Muti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Kuwajima, Sho, *Indian Mutiny in Singapore*. Calcutta: Ratna Prakashan, 1991.
5. Kuwajima, Sho. *Mutiny in Singapore: War, Anti-War and the War for India's Independence*. New Delhi, Rainbow Publishers, 2006.
6. Murfett, Malcolm H., Miksic, John N. et al.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First Settlement to Final British Withdraw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Nedumaran, N. *The Forgotten Sentinels: The Sepoys of Malaya, Singapore & South-East Asia (the Founding Years: 18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 Singapore: np, 2017.
8. Sareen, T.R. *Japan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Delhi: Agam Prakashan, 1986.
9. Sareen, T.R. *Secret Documents on Singapore Mutiny, 1915*. New Delhi: Mounto Publishing House, 1995.
10. Streets-Salter, Heather. *World War One i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in an era of glob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 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 Young, Ernest.P.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13. 佐藤鐵治郎 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整理，《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14. 岡本隆司 著，李雨青 譯，《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6。
15.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1984。
16. 俞辛焞，《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7. 柯文 著，林同奇 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
18.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9. 徐國琦 著，馬建標 譯，《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
20. 馬平安，《大抉擇：大變局中的袁世凱》，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21. 陳志讓，《袁世凱傳》，王紀卿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2. 黃德福，《袁世凱政權與英國：從辛亥革命到洪憲帝制》，臺北：元氣齋出版社，1994。
23. 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24. 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25. 應俊豪，《公眾輿論與北洋外交：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

(三)期刊・論文

1. Hsu, Immanuel C. Y. "Modern Chinese Diplomatic History: A Guide to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1 (Jan 1979): 102-120.
2. Kuwajima, Sho. "Indian Mutiny in Singapore, 1915: People who observed the scene and people who heard the new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1 (June 2009): 375-384.
3. Lowe, Peter. "Great Britain, Japan and the Fall of Yuan Shih-K'ai,"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3.4 (Dec 1970): 706-720.
4. Ooi, Keat Gin. "Between Homeland and "Ummah": Re-visiting the 1915 Singapore Mutiny of the 5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of the Indian Army," *Social Scientist*. 42.7/8 (July-Aug 2014): 85-94.

5. 川島真，〈20世紀以來中國外交史研究：以日本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1期 (2011.01): 134-144。
6. 王愛雲，〈洪憲帝制運作及敗亡新探〉，《蘭臺世界》2012年第24期(2012.08): 76-77。
7. 左雙文、王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史學月刊》2010年第1期 (2010.01): 5-16、56。
8. 朱華、范鵬鵬，〈護國戰爭中四川民眾的歷史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64 (2017.03): 119-128。
9. 周彥，〈日本與洪憲帝制〉，《求是學刊》1994年第2期 (1994.03): 113-118。
10. 唐啟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51.3 (2014.05): 67-69。
11. 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興大歷史學報》15 (2004.10): 201-217。
12. 張萬舉，〈芻議日本對袁世凱帝制運動之影響〉，杭州：浙江工商大學碩士論文，2015。
13. 趙敏，〈袁世凱帝制與日本之應對〉，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論文，2014。
14. 劉娟，〈洪憲帝制時期的中日外交〉，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1。